

中國長治久安之道

●周道濟（國立臺灣大學教授）

引 論

要展望中國的將來，必須先檢討中國的過去；要開創中國的光明前途，必須先對中國歷史上大癥結有正確的認識。

中國地廣物博，人口衆多，而又歷史悠久，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作爲一個中國人，對於中國的種種光榮，的確足以自豪。

但縱觀中國的歷史，自夏而商而周，歷秦漢、魏晉南北朝、而隋唐五代，下迄宋、元、明、清，以至於民國的今天，有時盛，有時衰，有時分，有時合，治亂相尋，循環起伏，並未臻於長治久安的境界。面對這種史實，作爲一個有志氣的中國人，於感慨惋惜之餘，便不能不深自省察了。

治亂興衰的根本原因

就我國歷史的演變來看，姑不論其細節如何，大體上，治亂興衰循環變化的情形，的確相當顯著。俗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便是這種現象的反映。孟子很早就提醒我們：「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註一）更是語重心長。至其原因，拙見以爲：最主要者，蓋有下列七端：

（一）領導人物方面的原因

我國在帝制時代，倘君主既賢且能，而又有良好的臣屬爲之輔佐，國家自易興盛；反之，若君主無識無德，臣下貪污無能，或心懷奸詐，國家自易衰亡。

一般言之，開國或中興的君臣大多比較能幹，亦較有蓬勃的朝氣。可是人性樂於軟熟，往往日久玩生，以致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君主的世襲制度，又不能保證繼位之君既賢且能，所以政治的清明也就難以長期維持了。方東美先生云：「中國歷代的理想政治只是在開國時代的一兩位君主，以後就因爲人君腐化，百官腐化，而把治世變作亂世，造成國家與人民的災難。」（註二）真是慨乎言之。

（二）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

我國過去的君主專制制度，對於君權缺乏有效的制衡力量。固然，其時輔弼之臣，對於君主的詔命可以封駁之，對於君主的言行可以諫諍之

，類此忠君愛國之事，史不絕書，間亦發揮了若干糾正作用；但就整個情形看，實不足以拘束天子，遏阻君權之步步擴張。至於天命民貴之理論、五行災異之學說，在限制君權方面，很難產生具體的效果，尤不待言。（註三）

這種情形，使君主易於「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走上「權力腐化，絕對權力絕對腐化」之路。（註四）從而，由制度影響到人事，再由人事影響到制度，每造成壞人得勢、紀綱蕩然的局面，終至覆亡。此項政治制度上的缺陷，與我國往昔每隔相當時期便改朝換代，也有很大的關係。

（三）人民心理方面的原因

天下大亂之後，特別是經過長期的動亂之後，人民疲敝不堪，十分痛苦，他們在心理上，普遍渴望能過着安定的生活，對於和平與秩序的希求，非常強烈。此際，如有人焉，毅然奮起，完成統一，洵爲臻於太平盛世之大好機會，蓋其時一般人民望治心切，在生活上易於滿足，對政府亦較少挑剔也。

天下承平既久，情況正與之相反：一般人民

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對於生活的要求，水
平愈來愈高，而對於政府，積多年之「舊帳」，
每懷不滿，「小不得意，則欲翼而飛矣」，此正
李觀所謂「治之民思亂，亂之民思治」者也。（
註五）

（四）社會結構方面的原因

天下大亂之後，豪傑敢死之徒多已被剪除，
餘者亦不得不遷就現實，而較少奢望。此際，新
的士大夫階層（即與新成立的政權有良好關係的
讀書人、以及由新政權所培植的讀書人）人數不
多，而政府的官位空缺，自中央以至地方，則所
在皆有，故容易安排。這批士大夫的出路既寬，
內心的怨懟亦相對地減少。

天下承平既久，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局勢稍
有不穩，則流氓盜匪各懷鬼胎，英雄豪傑咸興壯
志，他們多待時而動，以求利己，有的更對「貴
不可言的金龍寶殿」，心嚮往之，而無所顧忌。
到了此時，士大夫階層的人又愈來愈多，政府的
官位空缺則越來越少，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
書高」，且「學而優則仕」的觀念籠罩下，社會
的重心不是多元的，而是一元的。這批士大夫既
習慣以「高官厚祿」為第一志願，而政府中的官
額又不够分配，結果，必造成很多士大夫的怨恨
失望，終於在思想上及行動上都不免反對當時的
政府。此際，苟政治敗壞，任官沒有公道，致「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註六）國家的禍亂便更嚴重了。

（五）人口與糧食方面的原因

每當天下大亂之後，人口急劇減少，其時，

土地生產的糧食，大率足夠供應。惟進入太平之
世一久，人口復又增多，此時，由於農業技術依
然故我，並未改進，而土地面積不易隨之擴大，
故穀類的生產無法大量增加。陶希聖先生曾指出
：「歐洲近代社會的生產是擴大再生產，中國社
會的生產却是單純再生產。中國社會的生產，是
以同一技術、同量資本、在同一生產組織之內，
反覆實行的。」（註七）這一點很值得注意。

如此，人口愈增多，糧食愈匱乏，以致很多
人民常常吃不飽，生活日益困難。到了相當程度
，若干人民遂不得不鋌而走險，而盜賊起矣，動
亂生矣。薩孟武先生對於這種循環起伏的道理非
常重視，他說：「吾國為農業國家，農業生產力
不能供給社會的供需，或土地集中於少數人，其
勢必亂。到了亂極，人口減少，或地主流亡，天
下又歸於治。吾人讀中國歷史，即可知之。」（
註八）可見人口與糧食的相對關係，實為造成治
亂循環的重要原因。

（六）天然災害方面的原因

氣象學大師亨丁頓 (E. Huntington) 對於
氣象與歷史的發展有一套看法。他認為中國歷史
上的外患內亂都和氣候的變化有關，東晉時的五
胡亂華，北宋時契丹、女真的寇邊，明末滿清的
入關，都是因為中亞氣候之轉旱，乃不得不鋌而
走險。歐洲文化的發展，由埃及、巴比倫、敘利
亞，遷至希臘，再移至羅馬，近年來更由南歐轉
移至西歐，這些轉移，也可以用氣候的變化來解
釋。（註九）

考之我國歷史，天然的災害與國家的動亂，

確實每有其因果關係。昔西漢之亂也，據漢書食
貨志云：「枯旱霜蝗相尋」。西晉永嘉之亂，據
晉書五行志云：「大蝗自幽并司冀，至於秦雍，
草木牛馬，毛鬣皆盡」。隋季之亂，據新唐書李
勣傳云：「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唐末之亂
，據通鑑傳宗乾符元年云：「關東連年水旱」；
又舊唐書黃巢傳云：「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饑
為盜，河南尤甚」。南宋之亂，據宋史杜範傳云
：「早曠薦臻，人無粒食」。明末，張獻忠、李
自成之亂，亦與陝西「連年荒旱」大有關係，故
唐甄曰：「昔者，明之亡也，人皆以為內外交困
，國無良將，雖有良將，忌不得用，安得不亡？
烏乎，此其亡之勢也，非亡之根也。當是時，兵
殘政暴，重以天災，民無所逃命，故竄盜得資之
以為亂。」（註一〇）可見天然災害的時息時作
，對於國家的治亂興衰，影響頗巨。

（七）外國的影響

從歷史上看，外國——尤其是鄰接中國邊境
的外國，其行動與措施，對我國的治亂興衰往往
亦甚有影響。例如：秦漢時代的匈奴，魏晉南北
朝時代的五胡（匈奴、羯、鮮卑、氐、羌），隋
唐時代的突厥、回紇與吐蕃，以及宋代之於遼、
金、元，明代之於韃靼、日本、滿清等，這些外
國或異族，對吾國與吾民皆構成很大的禍患。以
二十世紀而論，國際關係更為複雜，像蘇聯、日
本、和美國，對我國的影響都很深遠。有人說：
民國二十年以後，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恐怕中
國共產黨也不會如此疾速發展，殆非誇大之辭。
所以，外國的影響對我國的政治是很有關係的。

三民主義乎？共產極權乎？

一九二二年，中華民國以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姿態，正式成立。但是民國以來，國事如麻，內憂外患，不絕如縷。方慶對日抗戰勝利，而中共坐大，不數年間，即席捲中國大陸，於是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退守臺灣。自是以後，三十餘年，中華民國恪遵三民主義，繼續推行民主憲政，而中共則實施共產極權制度。就長遠的觀點言，中國究應採行三民主義乎？抑厲行共產極權乎？實不能不加以剖析也。

(一)三民主義的要旨及其優點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的三民主義，以仁愛為出發點，在內容上，包含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三者之間有其連環性，亦有其不可分性。

民族主義的要旨為：①爭取民族的自由與平等；②維護國家的獨立與統一；③發揚中華文化，並吸收外國文化的優點；④在國際社會中，主持正義，提倡和平，促進世界大同。

民權主義的要旨為：①是以民主為本質的全民政治；②強調自由人權的合理化與真平等；③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實行五權憲法；所謂人民有權，即是國家的主權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人民則用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政權來表達主權者的意志。所謂政府有能，即是政府要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這些治權雖然力量強大，却受人民政權的約束。所謂五權憲法，即是以全民政治為基礎，以權能分立為前提

，以萬能政府為目標，而將治權分為以上五種的憲法。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有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的組織，便是根據五權憲法而來的。④均權制度的地方自治：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至於地方上的事情則儘量任其自治；不過，地方自治不是地方獨立，而是受均權制度的約束，故為均權制度的地方自治。

民生主義的要旨為：①小我與大我兼顧，物質與精神並重；民生主義的民，不只是單獨的個人，也代表全體國民、整個社會；生則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即是解決了穿衣吃飯住住問題之外，還要注意教育、文化、及正當娛樂。②既注重生產，也注重分配，講求均中求富，富中求均。③實施平均地權；④節制資本：包括節制私人資本與發達國家資本。這裏既然講求「節制」，當然允許合理的私人資本之存在。

概括言之，民族主義本諸倫理，求國家的自由與平等，反對侵略擴張，它是非侵略性的愛國主義 (Non-aggression Patriotism)；民權主義本諸民主，求政治的自由與平等，反對專制極權，乃是改良的民主政治 (Reformed Democracy)；民生主義本諸科學，求經濟的自由與平等，反對壓榨剝削，則頗類似溫和的社會主義 (Moderate Socialism) 而「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註十一) 故三民主義也可說是「唯民主主義」。

按：民主政治尊重自由與人權，強調憲政與

法治，形成開放的社會，能使政府領導階層和平轉移，這些都是它的長處；而其最大優點則在於有充分的彈性，以適應社會的進步與改革，故能細水長流，歷久而不衰。但一般的民主政治容易產生富豪政治，進而造成資本主義，並變成帝國主義；而過度講究自由人權易流於放任，且其政府有時會陷於軟弱無能，亦為常見的事實，這些可以說都是它的缺點。

三民主義充分掌握了民主政治的各種優點，但也有系統地儘量避免了民主政治易犯的缺點。透過民族主義的貫徹實行，我們將不會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透過民權主義的貫徹實行，我們將不會使自由人權泛濫成災，也不會使政府軟弱無能；透過民生主義的貫徹實行，我們更不會重蹈覆轍。凡此種種，都是三民主義的優點。至於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與共產極權政治所強調的「赤化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廢除私有財產」等主張，大異其趣，固不待言。

(二)共產極權的特點及其困難

共產黨的理論，多導源於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學說，其後經列寧、史達林以及毛澤東等的運用，乃成爲今日的共產極權主義。所謂極權，則是一種暴政，質言之，即專制獨裁的現代化是也。本來，有共產思想的人，不一定即是極權主義者，古代希臘的柏拉圖，有某種程度的共產思想，但他並不贊成唯我獨尊的專制。同樣，有極權思想的人，也不一定是共產主義者，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國的希特勒都是與風作浪的極權人

物，但他們並不贊成共產主義。可是，溯自本世紀之初，由蘇俄十月革命，而中共竊國，以至今日，共產政權與極權主義事實上已結有不解之緣。易言之，今日的極權國家雖不一定就是共產國家，而共產國家則幾乎全為極權國家，共產之於極權的關係，已非「混合」所可形容，殆已進入「化合」之境。這種情形，見之於蘇聯和中共，尤為顯著，稱之為「共產極權主義」，不但名實相符，而且入木三分。

共產極權的特點為：

(1)基於仇恨的觀念，主張由無產階級的革命和專政，以達到無階級的社會——實際上是無限期的專政，而真正專政者則是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頭目。(2)反資本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反動的、是不公平的，非打倒之不可。(3)排擊個人主義，不重視自由與人權：在共產極權社會中，個人的尊嚴與獨立性不受重視；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遷徙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生存權、財產權、參政權、平等權等，都毫無保障。(4)反和平主義：共產黨慣於滲透、顛覆、鬭爭，企圖赤化全世界，它在本質上是反和平的。(5)強調權力至上，組成極權的政府：這種政府是反憲政的、反法治的，它實施全面的獨裁、絕對的獨裁、暴虐的獨裁、一黨的獨裁，其獨裁的程度，較之過去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似有過之而無不及。

共產極權主義具有以下嚴重的缺點：

①對若干人情人性的違反，實非明智：極權政治無異是一種動員制度 (Mobilization System)。

生活在此種體制之下，人民時時刻刻都陷於緊張狀態之中，有「張」而缺少「弛」，時日既久，人為血肉之軀，有誰能忍受得了呢？何況，共產極權主義，於極權之外，還要加上共產主義，以徹底消滅私有財產為目標。這種政策，揆之人情人性，是明智的嗎？能行得通嗎？

②自由人權沒有保障：在共產極權統治之下，人民非常缺乏自由和人權，他們不但沒有表達意見的自由，而且隨時有遭受逮捕、失去生命的危險，生活既無安全感，又有什麼真正的快樂呢？

③社會單調而僵化：由於極權政治的控制過嚴，禁忌煩苛，人們不能自由地發揮其智慧，也不敢暢所欲言地發表其心得，從而，形成關閉的社會，單調而不能多彰多姿，終至社會僵化，沒有生氣。

④政府易流於腐化：極權政治本來就是很專制的，在這種體制下，獨裁者高高在上，為所欲為，人民沒有足夠的力量問政，而政府的組織系統又缺乏制衡，所以很容易流於腐化。

⑤國家領導人的繼位困難，導致政局不穩：這和民主憲政國家大不相同。在美國，羅斯福總統去世，就由副總統杜魯門繼任總統；甘迺迪總統被刺殞命，就由副總統詹森繼任總統。這是黨政的常規，沒有什麼可以想入非非的。但在共產極權國家則不然，史達林死後，立即陷於你爭我奪的局面，爭了很久，才由赫魯雪夫掌權；毛澤東死後，也有類似的情形。如此政局不穩，亦為共產極權政治的一大缺點。

如上所述，可見三民主義取精用宏，斟酌至當，不但內容豐富，而且方向正確，洵為救國建國之寶典。共產極權主義則多為一偏之見，並不足取，加以手段殘酷，方法恐怖，亦不足以使人心悅誠服。

如何使中國長治久安

(一)要針對治亂興衰的原因不斷改進

前已言之，我國治亂興衰的主要原因有七：即領導人物方面的原因、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人民心理方面的原因、社會結構方面的原因、人口與糧食方面的原因、天然災害方面的原因，以及外國的影響。倘以上的分析尚無大誤，我們便應針對這些原因加以不斷的改進。

舉例言之：如何使國家的領導人物，繼續繩繩，經常具備有才有識有德的品質，而名實相當，並使賢能之士，綿延不絕，蔚為國用，這些便都是政府人事上應注意的問題。如何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並使當政者不致貪污腐化，濫用職權，這些便都是政治制度上應注意的問題。如何造成開放的社會，建立多元價值的觀念，並實行公道政治，機會均等，以使全國上下，整合為一體，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些便都是為消弭人民心理上的不平不滿，合理調整社會結構，所應注意的問題。如何採取適當的人口政策，增加生產，公正地平均財富，並與他國保持互利的貿易關係，這些便都是解決人口與糧食的矛盾所應注意的問題。

如何利用科學方法，探測並預防天然災害，

以減少天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這些便都是我們為保障人民生活所應注意的問題。

此外，自二十世紀以來，由於交通快捷，資訊便利，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亦異常劇烈，尤其是若干列強，損人利己，侵略擴張，幾乎已達到毫無顧忌的地步。從而，國際政治對一國之生存與發展，其所發生之影響，較諸已往，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今日的中國固不能閉關自守，一味妄自尊大，亦不能隨聲附和，處處任人擺佈。故在國防上，如何加強國家的實力，發揮良好的戰略戰術，在外交上，如何擬定正確的政策，選拔優秀的人才，以確保國家的利益，擴大國家的影響，這些也都是有關我國治亂興衰的重大問題。

這些問題，解決得愈徹底，愈有效，禍亂之源便愈難存在。苟能如此，我們的國家不但能富強繁榮，必也可長治久安了。

(一)要加強實行三民主義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之所以要加強實行三民主義，並不是由於某一黨固執己見，更不是某些人意氣用事，而是因為三民主義確能順應民主憲政的潮流，切合國家與民衆的需要。

具體言之，三民主義對於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大體上，都已提出了正確而可行的原則與方法：

①根據民權主義中的五權憲法，透過其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及監察制度，國家的領導人物及政府的一般人事當可臻於能者在位、賢者在職，而日新又新，奮勉不息。

②根據民權主義中的權能分立原則，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權，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諸能，當可造成萬能政府，而又不失人民的有效節制。

③根據民族主義對國家統一之重視，對民族尊嚴之維護，以及其豁然大公、主持正義、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胸懷，益以民權主義所揭示的合理的自由與人權、及多彩多姿的開放社會，凡純屬私人之事，人民自己可以作主，各色人等均可作公平的競爭，苟有挫折，正不必怨天尤人，而冒死好事之徒亦將無用武之地。

④根據民生主義的均富原則及科學精神、與民族主義的國防需要，擬訂適當的人口政策，大幅增加糧食蔬果的生產，並作公允的分配，則人口過多與食品不足的困境，必可減輕。

⑤根據民生主義對科學之強調，以及民族主義對智能之發揮，不但可以防止若干天然災害，縱有災害發生，亦可失減輕其損。

⑥根據民族主義中所具有的保衛國家安全與維護世界和平之旨趣，益以民生主義對科學發展之重視及發達國家資本等辦法，以大力充實國防，調整政略戰略；根據民族主義所堅持的獨立自主、平等互惠及濟弱扶傾等原則，以擬訂外交政策，執行外交任務；並遵循民權主義的考試制度，以選拔優秀的國防外交人才，則我國的國防與外交必能充分發揮其力量與作用。

⑦根據三民主義的仁愛精神與互助原則，徹底實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當可使人民快快活活，社會欣欣向榮，國家平平安安。

結 論

國父孫中山先生悲天憫人，以大智卓識，創造了三民主義，其根本思想即在於民主憲政之發揚與推行，究其目的，固不僅在救中國於一時，亦在救中國於永遠。孫中山先生在演講三民主義時，開宗明義，力言「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註十二）其道理在此。從而，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我們今後如能確實把握此義，貫徹而施行之，過去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甚至一分一合的循環情形，當不致重演。這樣，我們的國家非但可富強繁榮，亦可長治久安，所謂「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自可實現。

今天，海峽兩岸的同胞無不希望中國能由分而合，永遠統一。但只講統一，而不致力於國家的富強繁榮與長治久安，則所謂統一，亦將缺乏真正的價值。但望全中國的有志之士，快快奮起，讓我們共同以三民主義之心，行三民主義之政，早日實現中國的統一，促成中國的富強繁榮，奠定中國的長治久安，開創中國的光明前途。

附 註

- 註 一：見孟子（朱熹集註），滕文公下。
- 註 二：見方東美主講，傅佩榮錄音筆記：「中國哲學之精神——三」。
- 註 三：關於我國歷代政治制度上的缺陷，請參看拙著：中國宰相制度研究。
- 註 四：李斯會上書秦二世曰：「是故主獨制」。

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見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又，英國阿克登爵士 (Lord Acton) 曾云：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見渠著·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49), p. 364.)

註 五：見直講李先生文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

註 六：借用屈原語，見楚辭。

註 七：見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註 八：見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

註 九：見竺可楨：「中國歷史上之旱災」。

註 一〇：見唐甄：潛書。

註 一一：此語出自孫文：「民報發刊詞」。

註 一二：此語出自孫文：「民族主義第一講」。

蔣經國一二三事

(本文插圖刊第42頁)

●查良鑑 (東海大學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

尊重司法重視法治

民國卅六年我在上海擔任地方法院院長。三十七年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蔣經國先生奉命擔任上海區管理金融的特派員。這時正是中共全面叛亂，積極從事各種破壞工作。金圓券幣制被破壞，整個國家金融秩序紊亂，上海物資為少數商人操縱囤積居奇，他奉命到上海大力整頓，以打老虎的精神，毫不徇情，公正嚴明，懲治奸商與幕後的主使人。凡是犯罪證據確鑿被捕的人，均送往法院，請求作公平有效的制裁。因此我們曾有多次的晤面，他嚴正的要求與干預，使當時的法院能依據法律規範，作最公平公正的處理。使得少數受到懲戒的人，心悅誠服；罪證不足的，無罪開釋。他尊重司法重視法治，尊重公權力與人權，我從那時起，即非常敬佩。他這一精神自是承襲先總統蔣介石一貫重視法治與要求

民衆守法的傳統訓誨。

當時有一位上海市中央民意代表，人很老實，協助平抑物價，到鄉下大量採購物資運到上海，在市面上平價供應，很忠實的聽他的話，對管制物價出了不少力。後來，物價管制失敗；這位民意代表受了不少損失，來到臺灣每次見到經國先生，經國先生總是先和這位代表握手，打招呼。連稱老朋友，老朋友；態度謙和誠懇，使這位代表非常感動，引以為榮。

民族文化道義精神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上午九時，南開大學中學旅臺校友在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為故校長張伯苓舉行百年誕辰紀念大會，經國先生時任行政院院長，閱報後自動親自前往參加。他日理萬機，撥冗蒞臨，同學們極為感動。他在會場上告訴同學們說：卅八年前大陸淪陷，重慶最後撤退時，先總統蔣公會和他前往探視臥病在沙坪壩的張

伯苓先生，慰問伯苓先生，請他同機飛臺灣。伯苓先生非常沉痛的表示他因病不能追隨政府前來臺灣。但他永遠崇敬蔣公，永遠和中華民國政府在一起。當重慶淪陷後，中共政權「總理」周恩來曾以南開學生身份去設法援張伯苓前往北平，當為伯苓先生所拒絕。這是先總統蔣公與伯苓先生重視中國民族的歷史文化和道義精神。我們聽後感念至深，永難忘懷。

經國先生為一虔誠基督徒，但他特別尊重所有宗教的自由與信仰，從不作任何的干預和禁抑。就以少數長老會的人，從事反政府的活動，以及超越宗教信仰的散發辱罵政府官員和散布煽動性的傳單，他亦從未加以責備或指示情治單位加以懲治。世界著名佈道家葛理翰博士某次前來臺灣，在中華體育館佈道時，經國先生會親自到會聆聽佈道。他和一般信徒一樣，坐在後面的位置上，規規矩矩的聽完，靜靜的離開，表達了他一片虔誠的心意！